



祖国永远是我心中的太阳

萧永安

上

编者按

萧永安学长是巴中61年届毕业生。2015年母校巴中70大庆是他也南下出席了这场盛会。

1960年，正当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侨居印尼的一大批热血青年怀着报国之心，不远万里，纷纷回到母亲的怀抱。我便是其中之一，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回想起回国前后的情景，和走过的历程，真是感慨多多，思绪万千。我父亲是二十世纪初以后与同宗同乡一起由广东大埔县下南洋来到新加坡，后到印尼雅加达谋生的。

上小学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孩提时代的我，隐隐约约知道祖国正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当我们兄弟姐妹不听话，母亲就会用“把你们送回唐山（客家人称中国）去放牛，去挨饿”来吓唬。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们到离家不远的驻印尼大使馆看电影，我们被祖国的锦绣江山所吸引，不自觉地接受爱国思想熏陶。小学时，曾多次与同学一起上街挨家挨户、挨公司挨店铺地手托着募捐箱为支援祖国建设募捐。

1960年初，发生了印尼军警使用武力，造成两名华侨妇女死亡，多人受伤的震惊东南亚的“芝马墟流



血事件”，并迅速酿成了打砸抢烧的排华反华浪潮。中国政府就此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印尼政府的非人道行为，决定派船接回数万被驱赶的难侨。当时在首都还没有出现排华迹象，我就读的巴城中学是爱国华校，我们高二年级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为被驱赶的难侨安置房屋，搬运行李，使他们能顺利登上祖国派来的船只回国。

在暴风骤雨袭击首都及各大城市之前，很多住在大城市的华侨深感印尼时局动乱，虽然家庭生活殷实优越，也不得不选择送子女回大陆。当时我大姐是60届毕业生，父母决定让我陪着大姐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曾先后两次回国观光，知道当时祖国非常困难，又考虑我们姐弟年少，就为我们分别准备了多达十几箱的日常衣物、食品等。记得在雅加达

鲁克港口那天，几乎所有同学的家长、亲人都到港口送别。哭声、欢笑声、歌声交织在一起，当我们所乘的荷兰籍“马来亚福特”号轮船徐徐离开港口时，每一个同学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不少同学还暗暗流泪。从雅加达港口，远跨太平洋，用大约十天时间到达了广东黄埔港，先后安排在广州石牌华侨补校、北京华侨补校补习语言、补习高中二年级功课。到八月份，根据本人志愿，调配到天津45中学高中三年级学习。记得当时约有20多位侨生到天津，我做为领队接受天津广播电台的采访，代表全体侨生用不流利的中国话发表感想和决心。当时天津45中学是侨生较集中的学校之一，到45中学学习、生活意味着我开始融入这个大家庭，与国内的同学一起同学习、同生活、同劳动，也开始了我的人生第二个转折点——艰苦地度过

生活关和语言关。

为了让我们侨生能过好生活关、语言关，我们得到了当时的教导处宁洪涛主任（后为校长）、专管侨生生活的钟德清老师以及班主任李济森、国内生班长、班委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使我们处在困难时期却不觉得孤独。特别是宁主任和钟老师，他们象长辈一样关心、帮助、照顾我们，直到现在我们这些归侨还念念不忘他们的恩情。前几年香港的45中校友还特意把80多岁高龄的宁主任接到香港约两个星期，还出资200万元成立45中学宁洪涛教育基金会，专门奖励优秀教师和优秀生，并出资20万元成立45中学乐队。印象深刻而难忘的45中学仅仅一年的学习生活使我度过了生活关，由不适应到较适应；度过了劳动关，由不会干简单的农活到会干一些农活。

通过高考，我考入了当时的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如果说一年的中学生活我主要度过了生活关，那么4年的大学生活我要度过语言关，并使生活由较适应到完全适应。大学与中学的最大区别一是与国内生同宿同住，二是与国内生同食堂吃，三是与国内生一起生活，四是到农村

搞四清时与贫苦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我在印尼时国语比一般的侨生差，到45中学又与侨生生活在一起，多用印尼语说话，使我的中国语言进步慢。上大学开始，除了上课专心听讲外，平时多与国内生接触，有时还主动到他们家串门，注重从语音、语调等各方面认真学习。小组讨论时，底下先用印尼文书写发言内容并翻译成中文后发言，慢慢使我的语言水平得到长足的进步，基本克服了侨生语调。也使我的功课逐年得到提高，为我以后教好书、写好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上进心强，大学二年级上学期我就入了团，在河北省独流减河的抗洪救灾中荣获天津警备区颁发的天津市“五好民兵”称号。在四清中也得到了较为深刻的很好锻炼。数载苦读后，1965年大学毕业。

当时正值祖国号召毕业生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对国情不太了解，以为户口象在印尼一样可以随处动，认为广州、北京、天津都待过，这次可到别的地方去了，本人思想又积极要求进步，通过查看地图，填志愿表时毅然填上内蒙、新疆、东北。结果却把自己分到了当时较